



# 自产与输入

## ——从纹饰风格看三星堆铜器群的不同产地



张昌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学术界就其年代、性质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热议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对于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目前大家多认为其年代在殷墟文化一、二期左右<sup>①</sup>,青铜器应当是在本地铸造<sup>②</sup>。

不过如何认识祭祀坑中出土数量只占少数的尊、罍等容器的性质和产地,值得进一步讨论。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主流看法是三星堆容器“具有浓厚的商式作风,……他们是当地铸造的,……模仿的原型应当是当时流行的商式器物”<sup>③</sup>。与此同时,大家多注意到三星堆容器与殷墟同类器的差别以及同长江中游地区同类器的相似形<sup>④</sup>,进而认为这些容器是受中原影响,影响的“媒介应该是今湖北、湖南地区当时的文化”<sup>⑤</sup>。

随着对整个长江流域地区商时期青铜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步认识到三星堆青铜容器产地为外地输入的可能性。从贝格立教授对三星堆容器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认识轨迹:(1990年)尊、罍等“这些容器很可能在四川、湖南都有铸造,但他们在设计上的特质似乎源自湖南”<sup>⑥</sup>。(1992年)“二号坑的尊、罍与湖南的同类器如此相似让人禁不住推想他们是从湖南输入的”<sup>⑦</sup>。(1999年)三星堆“尊、罍与长江中游地区同类器相匹配,充分说明他们是从那里输入的”<sup>⑧</sup>。许杰先生具体阐述了三星堆容器应当来自于鄂南湘北的依据:与三星堆容器密集的纹饰不同,其他类别大部分铜器根本不作装饰;在一些容器上钻孔说明这些容器为当地之用和有别于长江中游;南方青铜容器常常被用于盛放玉器,三星堆也有这一做法;三星堆非容器的铸造采用更为灵活的工艺,经常使用焊接技术<sup>⑨</sup>。

笔者曾撰文认为出土于长江流域不同地点如三星堆、巫山、城固、江陵、沙市、华容、岳阳、江阴等地的部分尊、罍、甗可能为长江中下游之间某一青铜文

明生产<sup>⑩</sup>,现在看来皖中南地区出土的尊可能也属于其中<sup>⑪</sup>。该青铜文明有别于宁乡、新干,但同样也和中原文化关系密切。这一认识主要基于这样的情况:这些容器之间的造型、纹饰、铸造技术风格高度一致,既不同于殷墟青铜器,又有别于南方其他青铜文明,有的还迥异于当地其他类别青铜器;这些容器出土地点恰好处于或构成文化传播的线路上;与青铜器高度一致的特征呈鲜明对比的是,出土容器的诸地点属于不同的土著文化,而且有些土著文化未必具备铸造尊、罍这种大型器物的能力。因此生产三星堆尊、罍等容器的是那支尚未为我们确定的青铜文明,亦即,三星堆出土的尊罍等容器并非在三星堆铸造。

三星堆及长江流域尊罍等容器的产地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三星堆文明和南方地区青铜文明构成、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传播等重大问题。借助自然科学应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但从目前已有的检测资料很难就产地问题得出结论性意见。南方青铜器除三星堆、新干外基本没有进行成分检测,各地出土尊罍无法相互比较。三星堆作了化学成分和铅同位素分析,铅同位素数据“就器物类别而言,武器和容器两类同位素比值数据略呈分散,神树面具等较为集中”<sup>⑫</sup>。显示出容器与其他器可能的区别,但铅同位素分析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的证实<sup>⑬</sup>。合金成分的检测,三星堆铜器数据的问题也较多<sup>⑭</sup>,大体来说,三星堆铜-铅-锡三元合金的构成、高锡与高铅合金兼有的特征与殷墟青铜器特征基本一致,只是容器不象殷墟和新干青铜器那样以高锡合金多见。另一方面,从铸造工艺的角度看,三星堆器物群使用不常见于殷墟文化的铸造工艺如焊接技术、垫片的使用、器壁内外保持凸凹相对应等做法,这些工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有相应的发现。目前在这些方面还缺乏全面的、足以区别南方不同青铜器作坊的观察和分析。我们期望将来对南方青铜器作更多成分分析特别是微量因素方面的分析。

在产地问题上,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设想:假定

三星堆不同器类均为同一文化同一产地,则他们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特别是装饰上或多或少有相融之处。在器形、铸造、纹饰诸方面,纹饰结构最复杂、可变性最强、也最能够体现不同人群的审美趋向和观念差别。如果再考虑到三星堆青铜容器和人像、面具之间在造型上缺乏可比性,纹饰是我们观察三星堆文化不同类别器群的最好视角。

## 二

为便于比较,我们将三星堆青铜器容器之外的器物视为一群,他们在器物的表现手法上大体有以下四类装饰。

A类:以圆雕、浮雕的手法表现人或动物的首、肢体和其他器官凸凹的轮廓,偶尔使用宽线来辅助表现眼、嘴、长方形格状的咧齿等。

B类:镂孔或独体的羽状或勾云状(报告称之为歧羽纹)装饰,往往从被装饰的主体中突伸而出,形成强烈的视角效果。有时也辅以稀疏的宽线。

C类:与容器近似的线性纹饰。如云雷纹、勾云纹、连珠纹等等。

D类:只见于三星堆文化的线性纹饰。如“太阳芒纹”、简化的兽面纹、回形纹、圆点构成的勾云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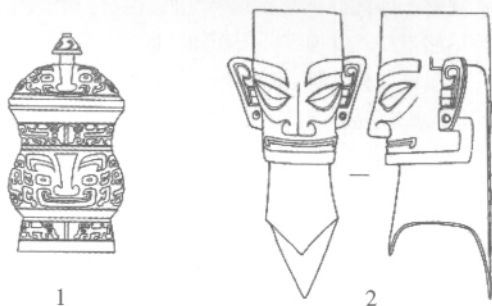
以报告发表图形资料为准,一、二号坑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容器器类装饰统计列表如下。

三星堆祭祀坑非容器器类装饰统计表

	器类	统计件数	装饰类别			
			A类	B类	C类	D类
K1	人头像	10	10			
	跪坐人像	1	1			
	人面像(具)	2	2			
	龙虎形器	3	3	1		
K2	立人像	8	7	3	3	2
	人头像	14	14			1
	人身形牌饰	1				1
	人面具	13	12			
	兽面具	3	3	3		
	兽面	9	9	9		
	铜树	✓	✓	✓	✓	✓
	神坛、殿	✓	✓	✓	✓	✓
	铃	14	2	8	2	4
	圆形挂饰	16	1	1		3
	扇贝形挂饰	14	14	2		1
	龙蛇形器	✓		✓	✓	✓
	公鸡	1			1	1
	鸟形饰	✓	✓	✓	✓	✓

注:“✓”表示数量不确定

由统计可见,A类装饰是三星堆非容器类铜器中最为常见的类别,特别是在三星堆主要器类——人头像、面具中,几乎不使用其他装饰,其他如立人像、兽面具、兽面中A类装饰的部位也几乎不装饰线性的C、D类纹饰。严格地说,A类装饰所表现的是人或动物形态的本身,而不是附着在另一主体之上的装饰,这是与殷墟、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器浮雕装饰的最大不同之处<sup>⑤</sup>。同时A类装饰一般不使用地纹,在视觉上光素而简洁,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所未发生的,在殷墟青铜器中不使用地纹的半浮雕兽面纹也直至最晚阶段才有少量出现(图一)。在细部上,



图一 商式的浮雕纹饰与三星堆的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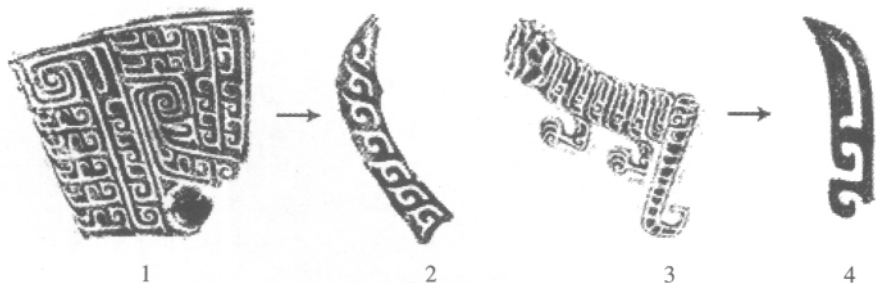
1.殷墟 SM53:27 觥(采自《殷墟青铜器》)

2.K2②:118Ba 型人头像

三星堆A类装饰在表现人或鸟等动物眼珠时,总是以三边或四边构成梭形,尊、罍及其他商式纹饰(即殷墟或长江中下游作风相似纹饰)则以浑圆构形,至殷墟二期又以椭圆形眼珠为主。同时,A类造型中人的宽嘴两端往往作下勾状,与尊、罍等兽面纹的嘴表现手法完全不同。

B类装饰也比较多见,特别是在鸟、龙形饰件上较为发达,因此B类装饰往往也与A类装饰相结合。B类装饰勾云纹、立羽的原型在二里岗文化上层阶段即已出现,至殷墟一期文化之前常见于兽面纹等纹饰中。图二表明,三星堆B类装饰明显是从尊、罍纹饰中分化而出,并形成独立的构图。由于勾云、立羽纹在商式纹饰中处于辅助地位,而在三星堆文化中独立构成饰件,并以镂孔等形式出现,视觉效果因此得到大大加强。三星堆三件兽面具(或称之为神面)额上的B类装饰是其发展的极致。因此也正是因为这三件B类装饰,使我们确知三星堆人头像和面具接受商文化影响的事实。

在三星堆非容器器类上,C、D类线性纹饰少见,装饰于立人像、铜树等典型器的底座和小型饰件上,位置多在器物表面较平的部位,除云雷纹、连珠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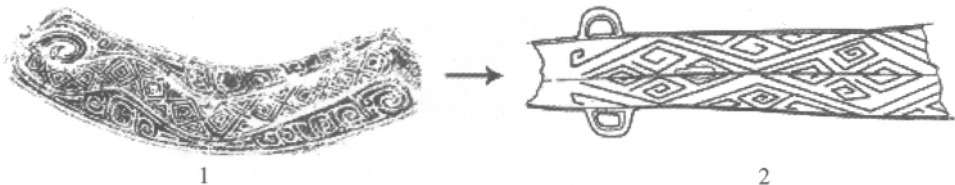


图二 三星堆非容器器类 B 类纹饰与尊、罍的关系

1.K2(3):23 罍尊 2.K2(3):193-33 3.K2(3):23 罍尊 4.K2(3):193-33

外,一般纹饰多作勾云状。线条较容器纹饰稀粗,亦不甚规整。因此 C 类纹饰虽然与商式纹饰相似,但多数仍然与商式纹饰有一望而知的区别。D 类纹饰虽为三星堆文化独见,但有些纹饰又可以在容器等商式铜器中找到原型。这些说明商式铜器对三星堆

带,有的衬以连珠纹。见于大型立人像、神树、神坛的底座以及人身鸟爪形足人像,也有结构分散的雷纹饰于神坛人像上身。云雷纹在二里岗文化阶段尚不多见,其兴盛是在半浮雕出现后作为地纹的使用。连珠纹在二里岗文化中常见,殷墟文化时期在南方青铜器



图三 三星堆鳞形纹

1.K1 龙虎尊蛇纹 2.K2③:113 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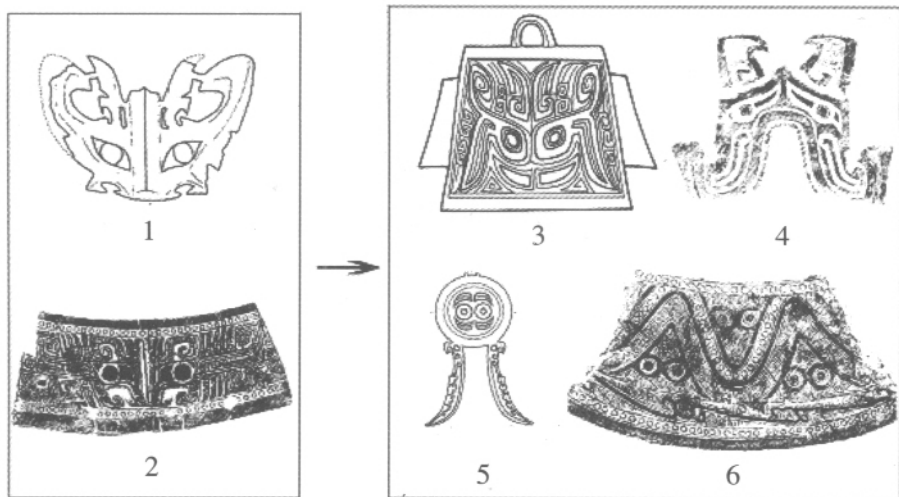
青铜器的影响。

下面我们重点考察线性纹饰中与商式纹饰的联系。

C 类类似于商式的纹饰最主要是云雷纹(或单独的云纹、雷纹)构成的长条、三角、转折、波曲形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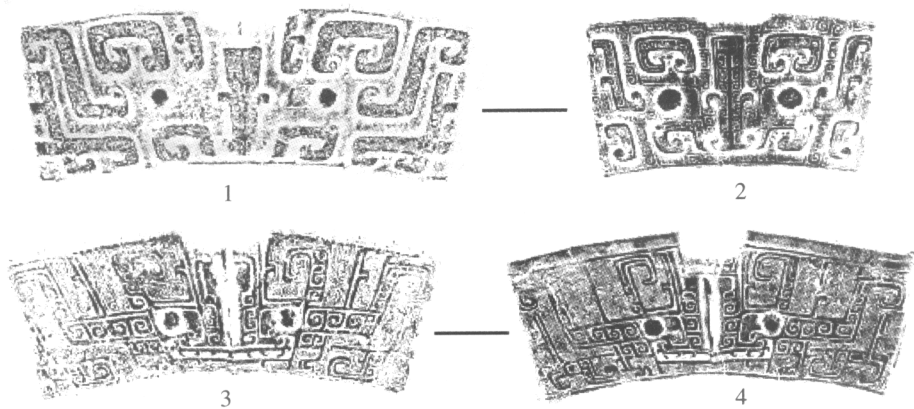
中仍然频繁出现,成为有别于殷墟青铜器的一个方面。三星堆非容器器类使用云雷纹显然也是源于商式纹饰,但在构图上又有所不同,其中波曲带状云雷纹是其特有的结构。

鳞形纹,见于神树底座(K2 :55)、神树及神坛



图四 商式兽面纹与简化兽面纹的关系

1.盘龙城 P-015 兽面 2.K2②:109 尊 3.K2③:103-28 铃  
4.K2②:150 立人像座腿 5.K2③:115-7 挂饰 6.K2③ 55 神树座



图五 三星堆尊与其他地区尊兽面纹比较

1.六安圆尊 2.K2②:159尊 3.城固64:1尊 4.K2②:79尊

上的立鸟及其他鸟饰上。这种纹饰为郑州、殷墟青铜器所不见,而在南方动物形青铜器如四羊方尊、双羊尊的躯体上,在容器上表现动物的角、尾时,成为常见的纹饰。三星堆尊壘的鸟体、兽面纹或兽首的角、盖纽均见鳞形纹,结构与上述非容器鳞形纹相同,他们应是非容器器类鳞形纹的来源。不过,三星堆非容器器类鳞形纹结构遑遑,远不及尊壘同类纹样工整,二者的差别仍然明显。例如,K2③:193-1铜鸟鳞形纹较其他鸟饰的鳞形纹规整,许杰已指出此器与吉美博物馆鸟纽器盖的相似<sup>⑩</sup>,应将其归入尊壘一类。

涡纹,饰于神坛人像上身及神坛顶部,用作辅助装饰。涡纹最早出现在二里岗文化阶段青铜罍上,一般是在罍的下腹饰一周独立的涡纹。殷墟青铜器中,涡纹经常作为主题纹带装饰器物如鼎的腹部。在南方青铜器中涡纹少见,且只出现在壘类器中纹饰的边缘部位如岳阳鱼魴山壘<sup>⑪</sup>,三星堆壘饰有涡纹,位置和结构与湖南鱼魴山壘完全相同。三星堆神坛上的涡纹与尊壘涡纹形态相同,应当是对后者的模仿。

菱形纹,饰于K2③:113蛇身。菱形由四个雷纹单元组合而成,其构图来自龙虎尊龙纹。龙纹在南方动物造型或装饰的青铜器上较为多见<sup>⑫</sup>,如其来源可能是殷墟青铜器或骨器上的菱形纹。龙虎尊身上龙的雷纹构图和其他商式龙纹一样,都是单行的雷纹,这是他们与三星堆菱形纹的不同之处(图三)。

D类纹饰中除了回形纹、“太阳芒纹”之外,其他如简化的兽面纹、圆点纹等结构虽与其他地区青铜器纹饰不同,但仍然可见其东来的线索。

简化兽面纹比较多见,装饰在神树、神坛及铃等挂饰上。多简化为双眼带角、躯足,有的只有双眼。C型铜铃(K2③:103-28)的简化兽面纹仍然可以看

出三星堆简化兽面纹是以商式兽面或兽面纹为原型(图四)。

圆点纹装饰在神坛及饰件上,多以圆点与勾云纹结合,形成独特的纹样结构。圆点应是连珠纹的变体,两种纹饰均为戳印而成。在南方青铜器动物造型青铜器如虎食人卣、四羊方尊均见圆点饰,是南方青铜器一个细部特点<sup>⑬</sup>。三星堆的圆点纹或许与之有一定联系。

总的来说,三星堆非容器器类青铜器在装饰上以较少使用纹饰为特征,这与同时期殷墟、南方其他青铜器装饰繁缛的风格完全不同。在数量不多的纹饰中,大部分又源自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商式或者是来自尊壘等青铜器,但大部分纹饰的结构、组合已经较大的变化。

### 三

三星堆容器有尊、壘、甗、器盖、盘。尊、壘、甗均有繁缛的纹饰装饰,纹饰布局比较程式化,即颈部为二~三道凸弦纹,肩部为夔纹,腹部及高圈足部分饰三~四组兽面纹。如上所述,这些纹饰中的一些因素在非容器器类中有所反映,但另一方面,我们难以找到非容器器类装饰风格对于容器的影响。圆形钻孔大约是三星堆文化唯一在尊、壘上的印记,但这些钻孔为器物铸成后形成<sup>⑭</sup>,不足以说明产地问题。

三星堆尊、壘与其东地区的长江流域尊、壘的相似性,不少学者已有详论,此不赘述。下图三星堆尊与南方系统其他尊兽面纹的比较可较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图五)。差不多可以说,三星堆每件尊、壘均有其在形制、装饰上的相似器在四川以东地区发现。方壘虽然在长江中下游未见相对应器,但四羊方尊及传世的鸟纽盖方壘<sup>⑮</sup>仍然说明南方地区此类青铜器



之间的密切关系。

容器中还见器盖、盘各一件,分别饰三角雷纹和连珠纹。两件器物均残,器形、纹饰简单,纹饰在非容器中有相似者。因此难以判定其性质。

通过以上对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尊、罍、甗等容器与非容器纹饰的比较表明,两个器群的差异表现强烈,而在两群相近的纹饰中,只见容器纹饰(或者说来自东部地区的纹饰)对非容器器类纹饰的单向影响,而绝对不见非容器器类纹饰对容器纹饰或装饰风格的影响。这种泾渭分明的现象显然难以支持两个器群属于同一文化、同一产地的解说。不难设想,以尊、罍等青铜容器代表着南方东部青铜文化逆长江而上<sup>②</sup>,传播到三星堆文化,其部分文化因素又为三星堆文化所吸收和引用,甚至于三星堆文化对尊、罍产生一种崇尚的心态,K2 :48 跪坐人像头顶尊——腹部的兽面纹被简化为阴线勾出的双眼——是其直接的表述<sup>③</sup>。除了尊、罍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玉器也先后传入成都平原<sup>④</sup>。东来文化的物质因素的输入并非只是青铜容器。

注释:

① 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的若干问题》,《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七章。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由于在祭祀坑和遗址中发现铜器泥心,因此报告第22页认为“铜器应是在该遗址范围内铸造的,而不是从外地输入的”。又,本文所引用资料及图片均来自此报告。

③ 李伯谦:《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理解和运用“文化滞后”理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④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难波纯子:《华中型青铜彝器の发达》,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8号,1998年。

⑤ 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⑥ Robert W. Bagley, A Shang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 Orientations, November 1990.

⑦ Robert W. Bagley, Changjiang Bronzes and Shang Archaeology. 《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上)》,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2年。

⑧ 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P20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⑨ Jay Xu, Bronze at Sanxingdui, Chapter . Ancient Schuan —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Robert Bagley Edited. Seattle Art Museum, 2001.

⑩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学集刊15——纪念殷墟发掘70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张昌平:《商代铜甗概论》,《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⑪ 安徽省皖西博物馆:《安徽六安出土一件大型商代铜尊》,《文物》2000年第12期。出土于淮河支流淝河东岸。高70厘米,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他高大的尊相同。

⑫ 出处同[2]附录。以下三星堆资料均出于此。

⑬、⑭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2003年。

⑮ 例如K2 :107 公鸡浮雕的躯体及首尾满饰写实的纹饰,即与三星堆文化风格相异。此器尾部饰曲折形纹样,与新干青铜器常见的所谓燕尾纹相同。又湖南芷江也出有类似器,见江柏永:《芷江发现西周青铜凤形器》,《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1987年。器高35、全长30厘米。器中空,冠前、尾后、底座均有长方形楔孔。报告认为不晚于西周,但凤背、胸部所饰鳞状纹为湖南地区象、猪、羊等动物形尊典型装饰,知其年代当在商代晚期。颇疑二者功能相近。

⑯ Jay Xu, Bronze at Sanxingdui, 50. Ancient Schuan --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Robert Bagley Edited. Seattle Art Museum. 2001.

⑰ 岳阳市文物管理所:《岳阳市新出土的青铜器》。《湖南考古学集刊》第2集,1984年。

⑱ Jay Xu, The Diamond-back Dragon of the Late Shang Period. Orientations, May 1998.

⑲ 与徐天进先生交流时,他提出这一特点。

⑳ 陈德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面具具有方形、圆形孔,先铸器而后钻、鑿而成。

㉑ 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第69器。国立故宫博物院,1998年。

㉒ 李学勤:《蜀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

㉓ 对于跪坐人像头顶尊的含意有不同的解释,但尊在三星堆文化的地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参注第3章。

㉔ 杨建芳:《早期蜀国玉雕初探——商代方国玉器研究之一》,《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